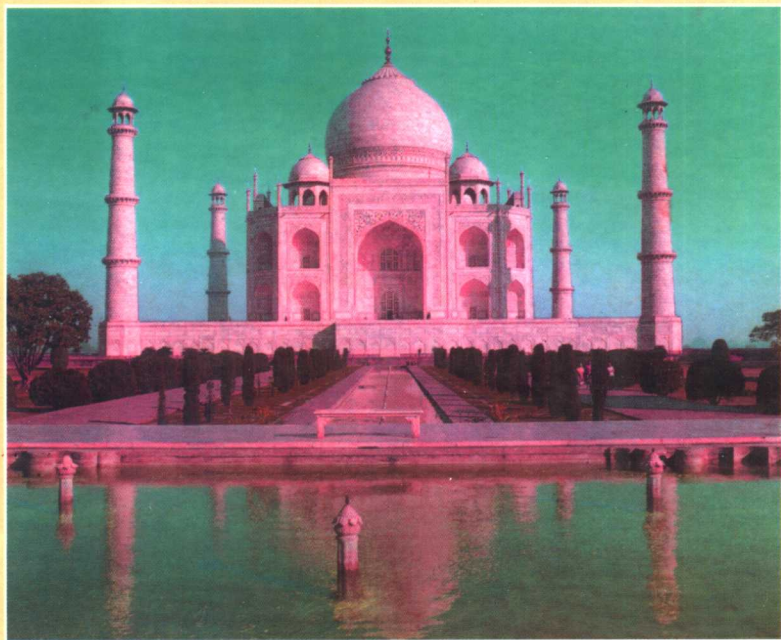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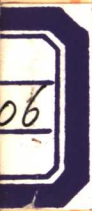


印度文学文化论

唐仁虎 刘曙雄 姜景奎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印度文学文化论

唐仁虎 刘曙雄 姜景奎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文学文化论/唐仁虎,刘曙雄,姜景奎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

ISBN 7-301-00750-7

I. 印… II. ①唐…②刘…③姜… III. ①文学研究-印度②文化研究-印度 IV. I35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317 号

书 名: 印度文学文化论

著作责任者: 唐仁虎、刘曙雄、姜景奎 编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0750-7/G·27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h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2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3.00 元

目 录

前言	(1)
“净修林”中的修行者	姜景奎(3)

论文学

论《戈拉》中的宗教思想	唐仁虎(13)
伊克巴尔诗歌的审美标准和创作特色	刘曙雄(28)
阿谢格的社会现实剧	姜景奎(44)
解读《蒂沃亚》及其中的女性	李 淳(65)
介南德尔·古马尔的小说艺术	魏丽明(76)
评雷努的边区长篇小说	冉 斌(92)
幻象与女人 ——读《蛇与绳》	石海峻(111)
略谈宇主的味论	贺 喜(123)
普列姆昌德创作思想的嬗变	陈丽君(142)
普列姆昌德在中国:译介、研究与影响	黎跃进(157)

论文化

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派别——印度教性力派	郭 童(174)
道教与密教中的女性崇拜	李 南(188)
佛经的比较文学意义	侯传文(201)

“你是天空,你也是鸟巢”

——简论《吉檀迦利》中的神秘主义…………… 陈 明(215)

印度两大史诗成因的文化意蕴…………… 孟昭毅(229)

从南亚神话到史诗

——印度文化源头论…………… 魏善浩(240)

从现代说服学看莎维德丽和

莎维德丽的说服艺术…………… 苏永旭(254)

附录…………… (279)

前 言

今年——公元2000年7月12日是刘安武先生的七十寿辰。作为刘先生的学生，我们有许多话想说，有许多事想做。但经过和先生协商，我们不得不放弃了为先生祝寿的想法。不过，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崇敬和祝贺，我们决定出一本论文集，名《印度文学文化论》。摆在读者面前的便是这部集子。

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这本论文集收入的文章既有论述印度文学的，也有研究比较文学的，还有不少涉及印度文化的。这反映出刘先生的学生把研究领域扩大了，对于全面研究印度文学与文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不难相信，先生的学生在新世纪里一定能与其他印度学研究者一起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其次，这本论文集集中的第一篇文章《“净修林”中的修行者》是一篇较全面介绍刘先生教学科研成就的文章。该文作者姜景奎长期与先生相处，十多年来一直得到先生在各个方面的指导和栽培。文章内容翔实，对了解刘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有帮助。论文集还编有一个“附录”，列出了先生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最后需要交代的是，这里的“先生的学生”指的主要是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国内访问学者，没有包括先生培养过的所有本科生。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先生的学生”都提交了论文。其原因有二：一，有的学生在国外，暂时没有联系上；二，有的学生虽然非常愿意提交文章，但由于太忙，没有及时完成。不过，我们知道，没有提交文章的同学和我们一样对老师抱有深深的敬意，和我们一样在内心深处为老师祝福。

这本论文集只是我们对老师表示祝贺和感激之情的一种方式。至于其中的文章,我们不敢说有多高的水平,也不敢说有多少新意。但却是我们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栽种在我国印度学研究园地的一棵树,她期待着更多园丁、更多读者的浇灌和养护。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年之行,也始于足下。在这万象更新时刻,我们惟有牢记老师对我们的教诲,惟有更加努力,用老师的所教来回报印度学、东方学研究,来回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才不负老师的期望。

愿所有的学生祝福所有的老师!

编 者

“净修林”中的修行者

姜景奎

刘安武先生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的资深教授,是我国印度近现代语言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他1930年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他先后就读于湖南大学、北京大学和印度的德里大学、贝拿勒斯大学,学习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和印度语言文学等。他学业优异,所获颇丰。完成学业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他辛勤耕耘,甘愿坐“冷板凳”,在三尺讲台和一方纸墨之间默默奉献,一千就是四十多年,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成为同辈学人中的佼佼者。

在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中,刘安武先生涉猎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1.对印度文学,特别是对印地语文学整体的研究;2.对印地语作家,特别是对普列姆昌德的研究;3.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研究;4.对印度神话的研究;5.对中印文学比较的研究;6.对泰戈尔的研究;7.对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刘先生翻译、写作、编选全方位出击,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中。到目前为止,他已有研究专著六部(包括与他人合作的一部)、文学译著七部(包括与他人合作的三部)、编著十七部(套)、发表文章四十余篇。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介绍和评价了印度文学和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印度学研究,填补了国内许多项研究空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为后辈

学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在治学态度和钻研精神方面,先生也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给后辈学人以很大的鼓舞。

在科研中,刘安武先生一向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对研究外国文学文化的作用。他从不说不根据的话,从不写未经自己考证的文章。季美林先生在为刘先生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一书作序时曾写道:“他在写本书时,读了大量的原著,参考了大量的印度学者的专著。多方推敲,仔细核对,决不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确,先生对这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阅读了书中提及的许多作品,翻阅了大量的印地语第一手资料。该书始写于1958年,开始时编写讲义,“文革”前基本完稿。改革开放后,他又加工整理,重写了某些篇章,到1983年才完全脱稿。历经25年而不废,由此可见先生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一书是对印地语文学的系统的介绍和评价,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印地语文学史。该书深入浅出,既全面又具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印度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在撰写《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的同时,刘先生还翻译了印度著名印地语文学史论家西沃丹·辛赫·觉杭的《印地语文学八十年》(收入《印度现代文学研究》)。这是印度人系统介绍现代印地语文学的很有影响的著作,是先生在众多同类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的。先生认为,介绍外国东西要有选择性,不能良莠不分地盲目介绍。这是非常真诚的对读者负责的治学态度,是后辈学人的学习楷模。他与季美林先生等合著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简明东方文学史》等也反映了他的这一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刘先生是这三部文学史的主要作者之一,并主持编写;他不仅认真完成自己所写的部分,还负责所有事务性工作。《印度古代文学史》付印前,他通读校样,再次订正了文字。他抱着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求名不求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夫不负有心人,这些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效应,得到普遍好

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获得北京大学社科著作二等奖、韩素音陆文星中印友谊奖、北京市社科著作二等奖以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得北京大学社科著作荣誉奖；《东方文学史》获得北京大学社科著作一等奖、北京市社科著作特等奖和全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得北京大学社科著作一等奖、国家教委教材一等奖、国家级教材二等奖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等等。除专著外，刘先生在对印度文学整体性研究方面还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如《印度文学》、《中世纪印度文学》、《中古印度文学》、《印度神话传说和文学》、《印度印地语文学》、《汉译印度文学》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印度文学进行了评介，既是专业研究者可以直接借用的资料，也是非专业人士了解印度文学整体概貌的宝贵材料，更是对我国印度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在研究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刘安武先生对不少具体作家给予特别关注，对他们进行了专题性研究。苏尔达斯和杜勒西达斯是印度中世纪的两位重要诗人，是虔诚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家。苏尔达斯的《苏尔诗海》和杜勒西达斯的《罗摩功行之湖》（一译《罗摩功行录》）是最有影响的虔诚文学作品，不仅是印度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印度教经典，对印度教民众有很大的影响。刘先生对这两位作家予以特别关注，他在查阅很多材料和研读具体作品后写出了《十六世纪印度大诗人苏尔达斯》、《苏尔达斯和他的〈苏尔诗海〉》与《印度中世纪大诗人杜勒西达斯》等长篇论文，对苏尔达斯和杜勒西达斯做了科学评介，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和点评。耶谢巴尔是印度现代印地语作家，他受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较大，属于印度进步文学的代表作家。刘先生对该作家很感兴趣，不仅在《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一书中对他进行专节重点介绍，还专门写了论文《战士——作家》，对耶谢巴尔进行了肯定性评介。伯金是现代印地语诗人，他以“吟酒诗人”著称，

先生的《吟酒诗人——伯金》一文是对伯金及其“吟酒”诗歌的全面论述。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其署名作者毗耶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存在与否、是否真是史诗的作者等都无定论。刘先生对这一问题也很有兴趣，论文《毗耶娑评传》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得。

在对印度作家的研究中，刘先生对普列姆昌德情有独钟，他对这位作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普列姆昌德是印巴分治前的印度著名作家，被誉为“小说之王”。从80年代初开始，刘先生陆续翻译了普列姆昌德的多部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新婚》、《如意树》、《割草的女人》和《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等。《普列姆昌德论文学》是他和另一位北大教员合译的普列姆昌德论文集，该论文集收录了普氏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许多有价值的文章。他还写有论文《试论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普列姆昌德的文艺观》、《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普列姆昌德评传》、《留得清白在人间》、《〈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前言》以及专著《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等。近几年他更是潜心钻研，笔耕不辍，刚刚完成专著《普列姆昌德评传》（和前面的一篇论文同名）。该书洋洋35万言，是他的普列姆昌德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他对普列姆昌德的爱、崇敬以及向后辈学人推崇普列姆昌德的圆满总结。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普列姆昌德生平和创作方面的资料很分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学者对此也感到手足无措，但刘先生通过大量的阅读、查找，搜集到了最为准确和全面的宝贵资料，做到了普列姆昌德的同胞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巴基斯坦的一位普列姆昌德研究者曾来北京大学进修，因为本国这方面资料很不全面，她向先生请教了关于普列姆昌德的许多问题，并获得了自己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材料。

那么，刘安武先生为什么如此厚爱普列姆昌德呢？《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中先生自己的一段话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如果说,作者(指普列姆昌德)的反帝反封建的创作反映了他的立场是广大人民群众立场的话,那么,从作者批判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腐朽或落后的意识形态来看,那他的立场则是工农下层劳动群众的立场了。作者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一边,总是站在受侮辱受损害者的一边。在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上,在弱者面对强者的情况下,作者总是同情和支持前者,而憎恶和反对后者。作者是真善美的卫士和辩护人。

这段话同时也是刘先生自己的人生观写照。他不仅研究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也研究普氏为人的高尚品德,他希望这种品德能影响后人,能得到发扬光大。也许这正是先生介绍研究普列姆昌德的真正用意所在。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也是世界著名的两大史诗,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非常不足。刘先生十分清楚自己作为印度文学研究者的职责,很重视对两大史诗的研究。季羡林先生在1980年为《罗摩衍那·森林篇》所写的《本卷附记》中曾说,自己在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查看印地语对照本,并感谢刘安武先生在这方面给予的帮助。早在70年代,先生就开始涉猎两大史诗了。要研究两大史诗,就得有恒心去苦读。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印度学学者30多年前曾断言,也许有人仔细读完了《罗摩衍那》,但绝对没有一个人读完了《摩诃婆罗多》。刘先生决心改变这一状况,经过长时间的潜心阅读,他终于成为真正认真仔细读完两大史诗的中国印度学学者。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并不只是简单地阅读,他每读完一个章节,都要认真做笔记。他的笔记中包括内容摘要、个人感想以及与前面相关内容的必要统计、呼应等等。可以说,现在刘先生对两大史诗非常了解,对其中的人物、

事件及矛盾之处了如指掌。就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言,先生先后发表了研究论文《黑天的形象及其演变》、《世界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试论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妇女观》、《毗湿摩和迦尔纳》、《艺术化了的伦理道德意识——〈罗摩衍那〉的一种倾向》、《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战争观》、《剖析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正法论》、《人和神的生与死》、《罗摩和悉多——一夫一妻的典范》、《关于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的国家观》等等。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对大史诗作了探讨、评价,发人深省。近期,刘先生又刚刚在上述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约25万字的《印度两大史诗研究》。这是先生近几年在这方面的研究结晶,是目前国内这方面极少的学术专著之一。此外,先生还选编了《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收集了印度、德国、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印度学学者对两大史诗的研究文章50多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有人说,印度没有历史,只有神话。这有一定道理。纵览印度古代文献,很难找到一部确切的印度历史著作。而神话著作却非常发达,从“四吠陀”到两大史诗,从“往世书”到虔诚文学作品,关于神的著作比比皆是。因此,不少印度学研究者对印度神话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刘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很大兴趣。实际上,他对两大史诗的研究也是对印度神话研究的一部分。另外,他曾研读过印度最古的“诗经”《梨俱吠陀》的“梵语—印地语”对照本,对“往世书”也有过专门的探究。《印度恒河的神话》、《印度神话中的三大神》、《黑天的形象及其演变》、《印度神话传说和文学》和《毗耶娑评传》等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不过,到目前为止,先生在这方面许多成果还没有面世。先生认为,印度神话纷繁复杂,绝不是看一两本或一两套书就能得出结论、做出成果的,是需要花大工夫、长时间去研究的课题。先生拟继续努力,争取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大成就。

前面已经说过,刘安武先生有很扎实的中国文学功底,他有足

够的能力涉足“中印文学比较”这个领域。他的《印度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某些异同》和《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短篇小说》等是这方面很有价值的论文。前者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着手,以神话、爱情、战争以及文人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等主题为基点,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印两国文学的共同点和差别之所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者属于普列姆昌德研究的一部分,该文从两位作家的文艺观、创作主题等方面入手,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两位伟人的短篇小说创作特点及异同。《汉译印度文学》也是先生这方面的一篇颇值一读的研究文章。

泰戈尔是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位世界级文学家。刘安武先生近几年也把他列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近几年来,先生在对泰戈尔作品的介绍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另外两位专家共同主编了《泰戈尔全集》。该套书共有24卷,约1000万字,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我国读者没有看过的作品。先生不仅是该套书的主编之一,还积极参与了翻译工作。其中的剧本《国王和王后》、《拜贡特的巨著》、《天堂的笑剧》、《国王》、《邮局》、《南迪妮》、《独身者协会》、《太阳女》、《时代之旅》和《邦苏莉》等都是他的译作,这些作品的大部分是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先生还为《泰戈尔全集》(戏剧部分)写了长篇论文《论泰戈尔的戏剧》,全面介绍和评价了泰氏的戏剧创作,重点点评了其中的名篇,如《国王和王后》、《国王》、《邮局》、《南迪妮》和《太阳女》等。另外,文章对印度的戏剧传统和孟加拉语戏剧的发展情况也做了相当客观的论述,还指出了我国历来在泰戈尔戏剧研究和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正确答案。不难想见,24卷本《泰戈尔全集》的出版必将使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向前迈进一大步,必将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印度学研究。从这一层面上说,刘先生等人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同凡响,意义重大,是泽被后世之举。

除上述专题性研究外,刘安武先生还在其他方面做了许多工

作。他在印度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还有：主编或主持编写了《印度现代文学研究》、《印度民间故事集》、《印度古代诗选》、《印地语汉语大词典》（合作编写）、《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参与）和《亚非外国文学简编》（参与）等，与他人合作翻译了长篇小说《秘密组织道路社》、印度诗选《孟加拉母亲》，翻译了《印度民歌》、《偷半个卢比的贼》、《她说过》、《司法大臣》、《生与死》、《获取荣誉的途径》、《不可接受的》、《接待》等散篇文章（诗歌、短篇小说），撰写了关于《佛本生故事》、《五卷书》、“中古南亚文学”和“苏尔达斯和杜勒西达斯”等方面的教材章节。这些成果虽然比较松散，也不成系统，却是先生印度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安武先生不仅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我国整个东方学的研究领域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曾经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两部巨著的编写，并担任前者“南亚文学编写组”和后者“亚非戏剧编写组”的副主编。他还是《东方文学作品选》、《简明东方文学史》、《东方短篇小说选》、《东方文学名著题解》、《东方文学辞典》和《东方文学史》的副主编，并主持实际工作。《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词典》的“亚非拉部分”和《南亚西亚散文选》也是由他选编的。正如前面所说，在做这类工作的时候，先生一向任劳任怨，孜孜不倦，严谨求实，工作甘人先，名利甘人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刘先生的积极参与，如果他没有这种不图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上述著作很难有今天这样大的影响，甚至很难问世。

此外，刘安武先生担任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季美林先生事务繁忙，加之年事已高，研究会的日常工作都是在刘安武先生的主持下进行的，对于研究会每两年一届年会的组织、每两届年会一本论文集的

编选以及筹款等事务,他事必躬亲,不惜精力和时间,努力做好每一件事,使同行学人有一个基本的归属感,在印度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先生还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对两组织的事务也很热心,他多次参与了这两个学会的会议,在印度学以外的领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刘安武先生既是一个作风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师长。1958年从印度学成回国后,他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为本科生开设“高年级印地语”、“印地语文学史”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80年代中期以来,他又担负起培养研究生的重任,先后开设了“印度文学史”、“两大史诗研究”和“普列姆昌德研究”等专题性课程,还准备开讲新课“泰戈尔研究”等。1988年,他培养出了“文革”以后中国首批印地语文学专业的硕士。1996年,中国第一位印地语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也在他的指导培养下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在培养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同时,刘先生还抽出时间和精力指导了好几位国内访问学者,这些学者都是国内其他大专院校的青年教师,分别来自江苏、天津、湖南、河南、辽宁等省市,因慕先生之名而投入到他的门下。到目前为止,先生培养出的学生在国内外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有的已经成为某些领域的专业骨干、学术带头人或单位领导,正在为我国的印度学、东方学研究和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所学和力量。

刘安武先生将届古稀之年,即将离开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开始退休生活。不过,先生从没有产生过停止科研工作的念头,他现在正在设计自己退休后的科研计划。他准备退休后重点进行三个方面的科研课题:1.进行中印文学比较的研究,争取发表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可能的话,将考虑写一本专著;2.继续研究文豪泰戈尔,拟完成专著《泰戈尔评传》;3.收集材料,深入研究印度神话,对印度神话类文献进行有系统、有重点的研读,力争编写出资料较全的《印度古代神话传说》。目前,先生身体状况良好,

对研究计划充满信心。可以想见,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及预期成果将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印度学研究,将使后辈学人大受裨益。

先生对后辈学人一向十分关心。在被问及对后辈学人的期望时,先生说,首先,做学问要实在,要做实实在在的学问,不能以虚代实。其次,先生希望后辈们在科研工作中不要急功近利,要深入研究,不能在匆忙中得出不适当的结论,或者为了出成果而忽视研究对象的深层次的本质性的东西。第三,先生告诫我们,做学问要甘于坐冷板凳,甘于清贫,甘于在享乐方面为人后;他提醒说,凡事得从大局出发,以多为社会做贡献为原则,不能以个人利益为重。第四,先生希望后辈学人能以老一辈优秀科研工作者为榜样,尽一切力量,努力搞好本领域的科研工作,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对我们的殷殷之情,可以看到先生对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和东方学研究所抱有的希望。

刘安武先生是印度学研究者,他对目前我国的印度学研究状况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力量不足,后辈人才较少。他认为,中印都是大国,其文化是两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类型,它们自古以来就一直进行着交流。我们应该沿着前辈们的足迹走下去。因此,他希望印度学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要有一种责任感,要把这种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而且要进行得越来越好,要力争取得更大成就,为中印友谊,为丰富我国的文化研究做出更大贡献。